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MINGE YU GUOXUE

MINGUO ZAOQI GEYAO YUNDONG DE HUIGU YU SIKAO

民歌與國學

——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徐新建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民歌與國學

——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徐新建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民歌與國學——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
徐新建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6. 6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7-80659-841-3

I. 民... II. 徐... III. 民歌—文藝研究—中國—
民國 IV. I207.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1762 號

民歌與國學

——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徐新建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8.25
字 數	20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841-3/I·267
定 價	2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劉文勇 段志洪

秘 書：姜 飛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章 “歌謠學運動”	(9)
洋人的先例	(9)
中國的國情	(12)
歌謠學運動	(15)
緣起：“徵集”歌謠	(17)
展開：歌謠“運動”	(17)
歸并：融入“國學”	(21)
第二章 民衆文化與精英立場	(24)
藉助“民衆”，確認“我們”	(25)
通過“我們”，鑒定“民衆”	(31)
第三章 “民”的發現與“歌”的采集	(37)
“三級社會”與官民之間	(37)

“民”的多義	(39)
新學界與“知識流”	(43)
何謂“歌謠”?	(53)
如何“采歌”?	(59)
“采歌”作何?	(65)
第四章 文學革命與國史更新	(80)
新國風與新文學	(81)
“擬民歌”與“偽民歌”	(88)
新思想與新形象	(94)
通過學術，重建國史	(99)
第五章 “讀”的歌詞與“聽”的演唱	(108)
文學與音樂：從文本到歌唱	(109)
時代強音：從民辭到國歌	(114)
傳統映照：從詩學到樂論	(123)
第六章 深入鄉野 觀風辨俗	(131)
由風到俗	(132)
“民”的擴展：從庶民到鄉民到蠻民	(139)
“歌”的充實：從故紙到書齋到現場	(142)
“學”的延伸：從歌謠(學)、民俗(學)到人類(學) …	(148)

第七章 官方干預與國家行為·····	(166)
官學兩界，若離若即·····	(167)
國家施政，辨風正俗·····	(179)
第八章 東洋“跳板”與西洋“先生”·····	(191)
作為“樣板”和“跳板”的日本·····	(192)
作為“對手”和“教師”的西方·····	(207)
第九章 個案與結語·····	(230)
朱自清“背影”的象徵·····	(231)
結 語·····	(244)
參考文獻·····	(248)
後 記·····	(257)

緒 論

20 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的文學研究出現了兩個相互關聯的變化，一是“跨文化研究”的提出^①，一是“比較詩學”的凸顯^②。如果說前者可謂“西方中心”已近終結之體現的話，後者應視為從“國別文學”的表象向“文化本原”的縱深拓展。這裏的“文化”，既與民族國家的個性相關，也同人類精神的共性相連。而“本原”的意義，也一方面包括了抽象內在的玄思，同時又直面着現實人生的來源。

於是，面對全球政治文化新秩序的重建，中國學界再次面臨的一個雙重交錯問題是：怎樣確立自己的文化之本，如何參與建構多元兼容的世界？在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的方面，則表現為

① 參見（荷蘭）佛克瑪（D. Fokkema）：《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標準》（沈小茜譯），載《中外文化與文論》創刊號，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94—96。

② 參見厄爾·邁納（Earl Miner）：《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中譯本，王宇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葉維廉：《比較詩學》，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年等。

還要不要開展進一步的文學交往，還能否進行真正的詩學對話？

對於這些重大問題，學術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闡發，並且多圍繞理論研討及現實意義的層面展開。其中既有對本土文論“失語”的警示^①，也有對中國文化將成為 21 世紀主導的達觀^②，以及對未來“和而不同”格局的倡導^③……

本書打算轉換一下研討的角度，單從民國早期的“歌謠運動”入手，重新梳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官、士、民各階層在對待民俗傳統上的不同立場和文化原因，同時也對中國文論和詩學演變的過程加以辨析，並由此回顧和反思自那以來“中西交往”的因果關聯。

提到近代中國的演變，往往就不能不談西方的影響。近來的一種說法是，“西方影響論”的泛濫，傷害了對中國自身原創的洞見^④。這是有道理的。“影響”一詞，本來就很含混：誰影響誰？怎樣、如何、為何影響？影響什麼？何以為證？都不易說清。既說不清，不如分頭說起，既討論輸出與傳播，也評述接受和引進，不僅關注交往雙方，也不忽略彼此的連接中介。並且，從近代中國所承繼的自身脈絡來看，西方的進入祇是一個外在的

① 參見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 年第 2 期。

② 參見季羨林：《東方文化集成》總序，載《東西方文化議論集》（季羨林主編），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年。

③ 參見樂黛雲：《文化相對主義與“和而不同”原則》，《中國比較文學》（上海）1996 年第 1 期；湯一介：《文化的多元共處——“和而不同”的價值資源》，載《跨文化對話》“創刊號”，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

④ 參見陳思和：《20 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幾點思考》，《中國比較文學》2001 年第 3 期，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頁 8—39。

側面。要想辨明傳統文化的現代走向，還得回到以民國社會為主體的本土探尋。

為什麼選擇“歌謠運動”為對象呢？因為“歌謠”廣泛進入民國學界的上層視野，集中反映了中國文論的歷史轉向，而“運動”的含義，進一步體現出近代中國從學界到官方、從精英到民衆以及從知識到實踐各個層面的社會風雲。隨着古今中西的上下錯綜，知識界逐漸形成了有關文學的新共識：詩的產生源於“歌”，文學的正統本於“民”，而使傳統形成和推動社會的力量則在“學”。於是，“歌謠運動”的發起和展開，便演化為由“民歌”向“國學”的提升與歸并。而民、歌、國、學的相分相合，最終導致的結果則是一方面有待完成，另一方面已交融為古今中西的“民國歌學”。

雖然“民歌”本身指涉的是民衆文化和民間文學，本應以對“民”和“歌”的考察討論為主，但由於本書關注的是作為“運動”的民國歌學，故祇把焦點對準參與發起到組織此項運動的“新知識界”，以及其有關民衆歌謠的“學”與“思”、“言”和“行”。

民國時期的“歌謠運動”內容很多，難以面面俱到。本書祇就其中三個層面來討論，即采集—宣傳、研究—致用、模仿—新作。其中既關聯文人發動和學界參與，也涉及官方舉措與國家行為。

近來的相關討論，已有了不少成果。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的一類，是把民國時期的歌謠運動總結為“目光向下的

革命”，探討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響應中的“民間轉向”問題。較為突出的論著有趙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①、洪長泰的《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②、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③和呂微的《現代性論爭中的民間文學》^④等等。這些論述都對晚清至民國時期知識界與民衆結合的現象提出了各有創見的看法。

其次的一類，是從文藝學、民俗學與人類學角度，總結歌謠民俗對文學研究及族群分析的幫助與拓展。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鍾敬文的《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⑤、李亦園的《民間文學的人類學研究》^⑥、董曉萍的《民間文學體裁學的學術史》^⑦以及段寶林的《紀念北大徵集歌謠八十周年》^⑧和葉舒憲的《文學

① 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② （美）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中譯本，董曉萍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

③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呂微：《現代性論爭中的民間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2期，頁124—134。

⑤ 鍾敬文：《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中華書局，1996年。

⑥ 李亦園：《民間文學的人類學研究》，《民族藝術》1998年第2期。

⑦ 董曉萍：《民間文學體裁學的學術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頁20—26。

⑧ 段寶林：《紀念北大徵集歌謠八十周年》，《民間文學論壇》1998年第2期，頁6—10。

人類學探索》^① 等等。此類研討，上承“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歌謠民俗的相關論述，下啓當代傳人在學科建構上的理論開拓，具有左右打通、繼往開來的聯結意義。

最後，回到文學交往和詩學比較，還值得關注的一類，是建立在近代中西交織與官民互動的“遺產”基礎上，對文論傳統的本土尋根和詩學還原。此類論著同樣很多，其中還包括較為尖銳的論爭和對話，比如余虹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②。該書發表後，就因對中國究竟有沒有“西學本義上的詩學”存在提出質疑而引發了一系列探討^③。不過，由於與本書所要着重論述的內容相關，有必要對涉及歌謠、文論的部分稍加提及。作為簡單的背景介紹，這裏僅以曹順慶的《中外比較文論史》為例。曹著認為，近代以後，在“西方中心論”偏見下，中國自身的文論傳統受到了不正常的擠壓和忽略，於是在觀照中西、溯本求源的努力中，提出了總體文論（General Literary theory）的多元重建。接下來，其對中國文論溯本求源的結果，是回到了蘊涵在古代風、雅、頌當中的本土起點。那就是：“詩”起源於“歌”，“文”受制於“論”。具體來說，《詩經》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夫也不良，歌以訊止”等唱辭，表達出以“美刺”為代表的文藝功用觀；《左傳》當中的“觀於周樂”與“審音知政”等言論，則體現了觀風、理政的詩教原理。這一萌芽於先秦的文論思想，

①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探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② 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三聯書店，1999年。

③ 參見徐新建：《比較詩學：誰是“中介者”》，《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4期，頁15—29。

傳承到劉勰的《文心雕龍》，便產生出溝通官民、文以載道的文論體系，曰：“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對此，曹順慶的評說是：我們切不可忽視這些自古長出的文論萌芽，它們往往是後世參天大樹的發端，或者說是世界文學批評這條漫漫長河之初源：

追本溯源，我們往往發現這些早期文學觀念的閃閃發光之處；順流而下，我們更可以看到後世文學理論所受到的巨大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深遠影響^①。

如果說這是詩學溯源上極有必要的“從古到今”的話，本書的努力則將是以民國歌學為中介的“由今及古”。並且筆者的意圖既不是再度回到精英，亦非單一的“目光向下”，而是力求在文史貫通和中西對應的基礎上，做到上下打通，雅俗關聯。在對象上，主要關注介於“官”和“民”之間的“士”——也就是晚清後逐步形成的所謂“新知識群”，或曰“智識階級”，關注他們在民國時期研討歌謠的原由和動機。在方法上，為了既保持中立，又避免刻板，便嘗試着把“他們”視為中國近代的特定群體，也就是像人類學以田野考察的方式進行的“族群”與“社區”研究一樣，把這個群體當作具有時代和本土共性的“學術部落”來考察述評。當然這祇是一種假定。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所

^① 參見曹順慶：《中外文論史》（上古時期）“引言”、“第一章：中外文論縱向發展的基本脈絡”，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40。

謂的群體——無論稱之為“智識階級”、“新知識界”還是“學術部落”，作為一個統一完整的階層，其實並不存在，而不過是當事人為了利益需要和論述者為了闡釋方便的說法而已。

遺憾的是，即便想做“學術部落”的田野描寫，由於材料的不足和當事人的消逝，第一手的現場觀察已無法進行，一切討論不得不借助這樣那樣的歷史記憶。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呢？說到底，不過就是將以往參與者的“自我贊頌”同後世論者的“主觀遙想”組成成所謂“文獻敘事”罷了。於是，正如人類學界在對經典“民族志寫作”的反思中指出的那樣，所有的“他者”研究，無論從對象還是作者的角度看，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超然和客觀^①；既然如此，還不如在觀察和寫作中明確表露出實存的“我”，從而不至於對讀者造成誤導。

本書的敘述也是這樣。既然民國時期的歌謠論者們都已不再開口，後人的評論與其說是事實的再現，不如說是自己與歷史的對話和對當下景況的另一種表達。

本書共九章。首章論述歌謠運動從發起徵集到并入國學的基本脈絡，同時對前期的“北大中心”予以簡評。第二章與第三章相互關聯，均由對中國傳統社會所謂官、士、民“三級結構”的分析入手，集中討論民國時期知識界發起歌謠運動的自身緣由以及相關的歷史背景。第四章敘述“新國風”與“新文學”及“新

^① 參見馬爾庫斯、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中譯本，王銘銘、藍達居譯，三聯書店，1998年，頁7—21。

史學”的關係，揭示知識界如何通過從文藝到學術的“民間轉向”，投身於國民塑造與國史建構之中。第五和第六章分別論述同一時期音樂、民俗和人類學界對歌謠運動的參與，力圖跳出單一學科的圈子局限，較為全面地認識那個時代“民歌研究”的整體面貌。從第七章開始，論述的角度有所轉移，先是加入了對歌謠運動中“官方傳統”的強調，並將其與常在以往文人敘事中扮演主角的“學界傳統”比照，一方面強調國家施政對歌謠民俗的社會影響，一方面關注此過程中學者文人與官方干預的若即若離。接下來的第八章，把目光移出本土，從中外互動的角度，分析“東洋”、“西洋”如何同樣參與到中國學界近代以來的“民間轉向”之中。九章作尾，收而未結，突出朱自清的個案意義，試圖再從微觀的層面追溯已經逝去的歌謠運動“背影”。

總之，九章裏面，“洋”在其外，“國”在其中，隱含着中外交往的時代背景；而從頭到尾，以“士”為主，兼及“官”、“民”，強調從中國傳統“三級社會”的基本結構來展開。

簡而論之，全書討論的不過就是四個相互聯繫的關鍵詞，即民、國、歌、學而已。初步組合，論述“民歌”、“國學”；連在一起，則綜觀“民國歌學”。

第一章 “歌謠學運動”

洋人的先例

1896年，意大利男爵韋大列（Vitale）出版了《北京歌謠》一書。該書收錄并解釋了一百七十首“北京歌謠”。儘管作者當時的描寫對象是中國，寫作地點也在中國（意大利使館），可面向的讀者却是西方。因此，其所介紹的歌謠便“不但是中文的，而且全都譯成英文”。從書的序言來看，作者的意圖是明確的，那就是：幫助西方讀者“瞭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與詳情”并

理解“真的詩歌可以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①。

韋大列說，爲了成就這一點，他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難。比如作爲洋人，在北京感到“受歧視”等，但最大的困難在於不知怎樣纔能“親自聽到”平民的歌謠“並把它們記錄下來”。於是在求人幫助（如他的中文老師以及英使館的 A. M. Raid 先生和德使館的 Krebs 先生等）之餘，他去郊外，在“廟宇附近”得到了許多與人民交接的機會，通過直接的采集，完成了對北京歌謠的收錄介紹。

時隔數年，韋大列的《北京歌謠》及其相關論述被轉引到中國，成爲“五四”時期中國“歌謠學運動”中被不斷提及的重要參照。將它譯成中文的北大學生常惠（維均）後來一度成爲《歌謠周刊》主編。而在先生輩的著名學者中，胡適、周作人等人也對此例多次援引發揮。胡適選用《北京歌謠》中的民歌，稱其爲“真詩”^②。周作人則不僅在《歌謠周刊》發刊詞（1922 年）裏以這位意大利人士的觀點說明北大學人關注歌謠的文藝目的^③，而且在關於歌謠的專文中稱其“極有見解”，且與中國學界比較而

① 參見韋大列：《北京歌謠·序》，常惠譯，收入鍾敬文主編《歌謠論集》，1927 年，上海書局《民國叢書》（四）1989 年影印版，頁 425—428。另，韋大列也譯爲衛太爾，《北京歌謠》也作《北京的歌謠》、《北京兒歌》、《北京歌唱》等。參見常惠《談北京的歌謠》（原載《努力周報》第 27 期，《歌謠周刊》第 42 號、43 號轉載，1924 年 1 月 20 日、27 日）、周作人《歌謠周刊發刊詞》（載《歌謠周刊》第一號，1922 年 12 月 17 日）和朱自清《中國歌謠》（作家出版社，1957 年，頁 155）等。

② 《讀書雜誌》第二號。

③ 《歌謠周刊》第一號，1922 年 12 月 17 日。